

敦煌世家大族崇佛及其社会教化

——以索氏家族为例

刘 佳

(兰州城市学院 教育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前辈学者对敦煌世家大族的研究论文较多,可以说,关于敦煌大族的相关问题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在敦煌地区,世家大族信奉佛教,凭借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佛教界独占鳌头,其中,敦煌索氏被称为“龙沙鼎族”,地位显赫、名人辈出,影响深远。他们在敦煌佛教界也同样颇有势力,这是他们在世俗社会中势力的补充,可以作为敦煌世家大族佛教界的代表。

[关键词] 敦煌;索氏家族;社会教化

[中图分类号] B929.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4630(2009)03-0008-04

前辈学者对敦煌世家大族的研究论文较多,主要有杨际平、郭锋、张和平的《五~十世纪敦煌的家庭与家族关系》、姜伯勤《敦煌邈真赞与敦煌名族》、史苇湘《世族与石窟》、冯培红《汉晋敦煌大族略论》、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池田温《八世纪初的敦煌氏族》、《唐朝氏族志研究——关于〈敦煌名族志〉残卷》等。在敦煌地区,世家大族信奉佛教,凭借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佛教界独占鳌头,其中,敦煌索氏被称为“龙沙鼎族”,地位显赫,影响深远。他们在敦煌佛教界也同样颇有势力,这是他们在世俗社会中势力的补充,可以作为敦煌世家大族佛教界的代表。本文拟就以敦煌索氏家族为突破点,论述敦煌世家大族的崇佛活动及其社会教化。

一、索氏家族成员的崇佛活动

(一) 家族成员大量出家

敦煌僧尼数量众多,早已引起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其中有许多是世家大族子弟。索氏家族成员中出家为僧的人很多,并且广泛分布于敦煌各个寺院,奠定了索氏在敦煌佛教界影响的基础。S.2709号《吐蕃辰年(公元788年)三月沙州僧尼布罗米净辨牒(算使勘牌子历)》是吐蕃占领敦煌后对当地僧尼所做的一次大规模的人口统计。其中索氏僧人有记载者如下。

永安寺索光证、索处净;开元寺索善来、索离

喧;灵修寺索了性、索普船、索广川;普光寺索普证、索善行、索悟智、索无念、索普岩、索普满、索广净、索善光、索真净、索悟真、索胜缘、索妙性、索善性、索善胜、索香岩、索真意。这一次人口统计共计有僧尼310名,其中含24名索氏家庭成员占僧尼总数的11%。而索氏家族的总人口占当地居民人口总数的6%。由此可见,索氏家族在宗教界的人数和势力都是相当可观的。

从莫高窟供养人题名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索氏家族僧尼人数的众多,在佛教界影响很大。莫高窟一四四窟为索龙藏为他的家族所开的功德窟,窟内供养人画像共三十幅,其中僧尼画像共九幅,占该家族人口总数的近1/3,比例很高。这些僧尼中担任教职者共有五人,例如,“妹灵修寺主比丘善……”、“妹尼普光寺律师巧相一心供养”、“妹尼普光寺都维证信一心供养”。僧人如“管内释门都判官任龙兴寺上座龙藏修先代功德永为供养”、“释门龙兴寺上座□□一心供养”。可以说索氏家族的人物几乎控制着这几所寺院。

(二) 向寺院施舍财物

佛教经典。在中世纪的敦煌,人们为了祈求来世的幸福和佛祖的保佑,向寺院施舍大量的经卷。索氏家族向寺院施舍经卷颇多。在敦煌文书中记载有S.4823号索道微向寺院施舍《土地论》,索季和捐入《瑜伽师地论》卷五十一,索绍员《妙法莲花经》,索洪范捐入伯3323号《金刚般若波

窟、四十五窟。它们记载了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历史,为后人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宝贵的文化遗产。其中第一四四窟是索氏家族所修的“报恩之龕”。第十二窟的窟主是坐落在莫高窟的敦煌金光明寺之高僧义巩所造,并由当时的河西都僧统唐悟真撰写了《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同洞窟一道流传后世。

二、索氏家族崇佛的社会教育意义

在佛教传入中国的初期,就有佛经宣扬造佛形像及其种种利益。阙译人名出《后汉录》的《佛说作佛形像经》载优填王说:“佛去后我恐不复见佛,我欲作佛形像,恭敬承事之。”表明造佛形像起初是佛教信徒为了便于在佛涅槃后礼拜、供养。

还有一些经典是专门论述和宣扬造佛形像的宣示不仅可以脱离三恶道,可以成佛,而且死后可以升天,复生可以生于富贵之家,真是福报多多。它们的传译,对于推动中国佛教造像活动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

许多大乘佛经在宣扬种种修行方法时,都同时强调了造像、供养佛像的方法。如隋阁那崛多译《大方等大集经》云:“菩萨摩訶萨复有四法成就三昧。何等为四?一者造佛形像,劝行供养;二者书写是经,令他读诵;三者慢法众生,教令发心;四者护持正法,令得久住。”

以索氏家族为代表的敦煌世家大族的崇奉佛教活动也基本上是遵从上述四种修行方法。

(一)书写是经——佛教经典的保存与流传

如上所述,在中世纪的敦煌,索氏家族向寺院施舍经卷颇多。他们或亲自抄写佛经,或请人代抄写。不论哪种写经形式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佛教信仰而做的“功德”。从他们抄写的经书中,大致可以看出索氏家族的佛教信仰。他们信仰的都是大乘教派的佛教思想,如《瑜伽师地论》、《维摩诘经》、《金刚盘若波罗蜜经》等大乘佛教经典,还有佛教戒律如《四分戒本》。索氏家族向佛教寺院施舍的大量的佛经对于敦煌地区佛教经典的保存和流传起到很大作用,同时也促进了敦煌地区佛教教学和研究水平的提高。

(二)教令发心——佛教思想的广泛传播

索氏家族成员分布于敦煌佛教教团各阶层中,影响颇大。索氏家族中的僧尼将索氏家族的影响带入寺院,控制着敦煌佛教界。他们能够在佛教僧团中担任都教授、都僧统等职是索氏家族

势力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他们在佛教、医学等方面的造诣深厚的表现。他们当中还有不少人身兼数艺,不仅是僧界高僧,而且还拥有精湛的医学造诣和儒学修养,这样的具有较高文化和道德素养的高僧自然吸引了不少敦煌地区的僧俗人士前来学习,佛学和儒学同时得到广泛的传播。

(三)造佛形像,劝行供养——佛教寺窟的教化意蕴

1. 加强家族内部的凝聚力

索氏家族修造佛教寺院的情况,前已述及,此不赘述。修建在莫高窟的佛教壁画和塑像,是索氏家族“造佛形像”的实际行动。敦煌索氏家族的僧俗在莫高窟所营建的大型洞窟,实际上是被作为其家族各自的“家窟”而世代相承,这些洞窟几乎都被窟主们利用来为自己的现实利益服务。索氏家族在莫高窟修建的几所大型“家窟”,实际上成为了他们家族内部顶礼膜拜、世世代代称雄敦煌的依托。

这些“家窟”在敦煌历史上也起到了不少积极的作用,它们实际上是自己家族、宗族乃至整个敦煌的汉民族的凝聚力的体现。^[3]人们瞻仰洞窟看到的不是绘制在洞窟中的佛和菩萨,而是修造这些洞窟的世家大族,祈求的是这个大族的祖先保佑自己,或许他们身边的“神灵”比那些从未见过的佛菩萨更了解自己的苦难吧。索氏家族成员凭借他们的实力在莫高窟修建了这些大型的洞窟,实际上是以这种方式告诉后人,他们是索氏的后代,他们的祖先在这里留有印迹,而且这些印迹也许会传延千年不朽,任何一位索姓后人在瞻仰了这些洞窟之后都会不约而同地怀想他们的祖先也许正是修建这些洞窟的人。

2. 对外教化功能

正是由于像索氏家族这样地位和名望的家族成员如此崇尚佛教,才会引导敦煌地区的其他民众追而仿效。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的“士”阶层,他们的思想和活动往往代表了整个社会的风尚,对底层民众的思想和信仰往往能起到榜样引导的作用,敦煌地区佛教如此兴盛,离不开像索氏这样的大家族的引导。

(四)护持正法,令得久住——对禅宗信仰的感召

公元九世纪初,吐蕃统辖沙州期间,敦煌名族巨鲁索氏家族中,出现了被称为“顿悟大乘贤者”的世俗佛教修行者。

P.4640号唐和尚作《沙州释门索法律窟铭》

云：“皇考顿悟大乘贤者，讳定国，英旄隼彦，早慕幽贞。悟世荣之不坚，了浮生而走电。耕田凿井，业南亩而投簪，鼓腹逍遥，力东皋而守分。”

索定国为一个世俗人，是沙州释门都法律索义辩之父，卒于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其子索义辩为金光明寺僧，是莫高窟晚唐时期第12窟窟主。据P.4600号《金光明寺故索法律邈真赞》记载，索义辩是禅宗信徒，被誉为“灯传北秀，导引南宗”。饶宗颐先生指出，八世纪末曾经滞留敦煌的禅宗南宗神会弟子摩诃衍，其“大乘顿悟说，本质上是融合南北宗而形成的”^[4]，“神会以后南北宗逐渐走向调和的道路”^[4]。在九世纪初沙州名僧索义辩的身上，再一次看到“北秀”即北宗神秀与“南宗”即惠能、神会一系相调和的倾向。

索义辩的禅宗信仰与索氏家族的信仰有关。在索家窟东壁妇人像题记中有“……修行顿悟优婆姨如□一心供养”，在男性的场合则有“顿悟大乘贤者”的例子。上山先生认为，如索家此例，可知有专门修行顿悟禅宗的人们，而禅院或即此种场所^[5]。

所谓“顿悟大乘”，在八世纪末沙州文献中指禅宗。也就是说，“顿悟大乘贤者”和“顿悟大乘优婆姨”所习者为禅宗。他们都是世俗人，这说明了吐蕃管辖沙州以后至五代、宋时期，沙州有许多世俗男女随某一寺院的禅师或禅院进行禅宗修行。

除索氏家族外，敦煌其他的名族如翟氏、阴氏也都修习禅宗。P.4600号悟真撰《前河西都僧

统翟和尚邈真赞》，翟僧统于公元863~869年在僧统位，赞文云：“五篇洞晓，七聚芬香。南能入室，北秀升堂。戒定慧学，鼎足无伤。俗之標秀，释侣提纲。传灯暗室，海喻浮囊。五凉训师，一道医王。”

翟僧统法荣于九世纪后半期兼习禅宗南北宗，但在P.4640号唐僧统述《翟家碑》中，又记载翟僧统宗承七祖，碑文云：“五乘之奥探玄，七祖之宗穷妙。P.4640号《沙州释门法律窟铭》载：“心印密传。穷七祖之幽宗，示三乘之淳粹。”

总之，唐宋之际敦煌世家大族崇信佛教，以家族信仰的方式信奉禅宗佛教，虽为了他们的世俗目的，但对于佛教本身的广泛传播也起到积极的作用，世家大族众多成员信仰佛教、依赖佛教的行为给其他普通百姓起到了榜样示范的作用，鉴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影响力，其一举一动都被普通百姓视为一种动向，因此也纷纷仿效，这也许是敦煌地区佛教如此兴盛的一个原因吧。

[参考文献]

- [1] 郑炳林.《索勋纪德碑》研究[A].敦煌文献研究论集[C].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
- [2] 史苇湘.世族与石窟[A].敦煌研究文集[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 [3] 马德.敦煌莫高窟史研究[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1997.
- [4] 饶宗颐.选堂集林(中册)[M].香港:中华书局,1982.
- [5] 上山大峻.敦煌佛教的研究[M].京都:京都法藏馆,1990.

The Suo's Family of Dunhuang's Buddhism and Social Eduaction

LIU Jia

[责任编辑 韩文奇]